

内部材料 注意保存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辅导材料

一九八一年七月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王 洪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以后，受到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普遍的热烈的拥护。大家都在认真学习。我也正在学习。这里所讲的是个人的学习体会，作为思想交流，目的是向《决议》看齐，把认识统一到《决议》的基础之上。由于我对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缺乏深入的研究，解释问题时难免有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提出批评，以便改正。

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是《决议》的最中心、最根本的问题。按照《决议》的顺序，讲五个问题：一、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四、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五、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

一、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7节，实事求是地、公正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决议》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实事求是地、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要排除感情用事。有许多人（包括群众和干部）因为“文化大革命”造成了灾难，对毛主席有意

见，有的意见比较强烈，甚至产生一种否定一切的倾向。另外，广大的群众和干部，特别是老工人、老农民、老战士和老干部，他们长期受毛主席的教导，亲身感到毛主席的正确，亲眼看到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辉煌的胜利，因而对毛主席有感情（这里不能笼统说是迷信），其中有些人就不愿意把错误同毛主席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讳言他的错误。这两种情绪都有片面性。否定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或者讳言毛主席的错误，都不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态度。我们要保持科学的、冷静的头脑。我们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对于毛泽东同志，对于毛泽东思想进行公正的、全面的、合乎实际的评价，这是跟我们党和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件大事，不能采取轻率的态度。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采取轻率的态度，那就会使广大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对于社会主义中国在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发生某些模糊的认识，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所以，我们对这样的问题，必须采取十分审慎的态度，决不能感情用事。

那末，究竟毛泽东同志的一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呢？这个问题在群众和干部中曾经是有各种不同看法的。《决议》明确指出：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决议》列举了毛主席的伟大功绩，并指出这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有的人认为，五十年以后，或者一百年以后，对毛主席的评价要大大下降。这种想法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看一看我们现在怎样审慎地、客观地对待中外历史上的人物，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后人同样会审慎地、客观地对待毛泽东同志。

在年轻人中间，有极少数人认为毛泽东同志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也就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而是农民革命领袖。理由是说他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种论断，说明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没有起码的了解。

这样看来，《决议》增写“建国以前二十八年的回顾”，非常必要。前

人说过，不知有汉，焉论魏晋。讲的是从历史的连续性中，才能掌握历史问题。最近，报纸上发表抗战初期毛泽东同志的五封电报，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学习《决议》，了解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的转折关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领导，从而认识毛泽东同志一生功大于过这一历史评价的正确性。

在肯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问题上，应当指出邓小平同志所起的重大作用。

首先，在如何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问题上，小平同志始终坚持以下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同他的不朽功勋相比。小平同志说，没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中国革命很可能还在黑暗中苦斗。这样说是不过分的。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否认个人、特别是杰出的领袖人物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功绩时说过，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活动，使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38页）同样，我们可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对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小平同志认为，一方面要正视，另一方面要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是复杂的，党亦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联系到评价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总的原则应是“宜粗不宜细”。怎样理解“宜粗不宜细”？“宜粗不宜细”，是科学的、按历史唯物主义评价人物的原则，不是“为贤者讳”（因为《决议》已经指出了毛泽东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个原则要求抓主要问题，本质的问题，不要纠缠枝节，更不能从推断出发，建立批评。我们对于前人，实际上是执行这个原则，我们的后人对我们亦将执行这个原则。只有同时代的人，才对于许多细节，谈得津津有味。对于毛泽东同志这样的领袖人物，评他的功也好，评他的过也好，主要着重于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得失，而不是其他。小平同志还指出，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

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这些意见是非常重要的而又非常恳切的。有一家大学学报（一九八〇年第四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文章，不仅是一般地说过头，而且相当地出格了。这篇文章说毛主席和我们党中央是“一个反科学、反民主、反进步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以农业社会主义为核心，以封建社会主义为归结的派别”。这种说法确实只能起动摇党心、军心、民心的作用。这种错误是很明显的，这里不多讲。关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否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需要解释一下。

拿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来说，就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造成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长期以来，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根据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情况，宣布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以后，毛泽东同志轻易地改变了八大会议的决议，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九年，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和在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并把这种批判和斗争说成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一九六二年，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掀起反修防修运动。一九六三年，在过分估计阶级斗争情况的严重性的基础上，开始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九六五年初，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一九六六年，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纲领的《五·一六通知》，声称有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

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要发动群众起来进行夺权。很明显，这些观点和估计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我国的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因而，“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和破坏。但是，毛泽东同志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决议》所作的这些分析是正确的，恰如其分的。有人认为，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什么“主观上为了反修防修”，就是为了整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恩格斯说过：“要明确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58—459页）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我们党的历史经验也证明，要获得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光有正面的经验是不够的，还需有反面的经验。正面经验固然可以使我们有正确的方向，反面经验也可以使我们吸取教训，变得更加深思熟虑。

其次，小平同志一直强调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指出，《决议》最中心、最根本的一个内容就是要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不仅今天，而且今后，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决议》要写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要确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不提毛泽东思想，老工人和土改时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广大战士通不过，同他们有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在是否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是不能让步的。这是国际国内的重大政治问题。有些非洲国家的领袖人物说，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的，也是第三世界的。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南写进

《决议》中去，今后革命和建设的分量会削弱。不写毛泽东思想，不坚持毛泽东思想，要犯历史的大错误。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做的各项工作，归结起来，就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和搞错了的事情纠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经过我们的努力去做好。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要做的，还是这几件事。有的人对“拨乱反正”的口号有异议。其实，我们说的“拨乱反正”，即拨林彪、“四人帮”之乱，拨毛主席错误之乱，返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当然，在做的当中我们也有发展，今后也还要发展。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可推卸的光荣历史责任。

由于小平同志的正确指导，《决议》关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一部分，写得很好，受到普遍的赞扬。这就回答了过去国内外的某些怀疑和指责。在国内，有的人说现在的中央领导对毛泽东思想是抽象肯定，具体否定；有的人说是“砍旗”。在国外，有的人说我们搞“非毛化”。现在的《决议》，证明上述的怀疑和指责是没有根据的。

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

《决议》第28节完整地、科学地而又非常简练地概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质。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这个概述比七次大会的文件更完备、更科学。

什么是毛泽东思想？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起来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这是继承了“七大”文件对毛泽东思想所作的科学规定）；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不是毛泽东同志的任何一句话、一个意见或一个观点）；是中国共

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不是一个人的“天才创造”）。在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胜利前进方面，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最大，所以，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来代表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决议》说：“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否认毛泽东同志的主要作用或者否认党的集体的作用，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不正确的。例如，在人民军队建设史上有重大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的产生，就是由毛泽东同志起主要作用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各持一端，否认中央“九月来信”所起的作用，或者抹煞毛泽东同志的主要作用，都是不妥当的。黄克诚同志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就是要说明毛主席的主要作用。

讲明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就可以回答近几年来、直到《决议》起草期间的一个大争论：毛泽东思想是否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失误，是否包括毛泽东同志晚年比较系统的错误理论观点？根据七次大会以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义，当然不包括。邓小平同志在三中全会前后，主要是在理论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中，回答过这个问题。当时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提法，他要我们完整地（不是零碎地）、准确地（不是歪曲的）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是针对林彪、“四人帮”歪曲、篡改、肢解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讲的，也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讲的。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两次大的曲折，许多新问题亟待解决，只有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纠正过去的错误（主要是毛泽东同志本人所犯的错误），才能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解决新时期提出的新问题，夺取新胜利。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提法作了解释。他说，这是指毛泽东思想所包含的始终一贯而不是前后矛盾的和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基本原理。至于个别论断，无论是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这些不属于他们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从实际出发，主张调查研究，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有些时候，主要是在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接近

群众、接触实际比较困难了，受到他身边的一些坏人，象“四人帮”这类人的包围，作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论断，这些不应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围。

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提法，或者可以改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比较通俗易懂，而“体系”一词较为费解。过去（现在可能有改变），有的同志不同意小平同志的解释，主要不在“体系”二字，而是认为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理论，也包括他的错误理论。他们认为，凡是毛泽东同志的文章、著作、讲话、批示、信函，等等，都是毛泽东思想（这是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具有特定科学含义的毛泽东思想混同）；因而，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定义，他们认为可以套用列宁给马克思主义所下的定义，即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

列宁是讲过“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的话（见《卡尔·马克思》）。但是，我认为不能套用。因为，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是指马克思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进行革命改造并对新兴无产阶级运动进行总结所创立的学说和观点的体系，而决不是包括马克思年青时代接受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及伏尔泰、卢梭等的影响所具有的学术、政治观点，列宁指出，从一八四二年和一八四三年开始，马克思才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这时，“马克思刚刚成为马克思，即刚刚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5页）。正是由于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列宁的定义是很清楚的，不言自明的。如果给列宁主义下定义，就不能照搬了，只能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能简单地说列宁主义是列宁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因为它不能表示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同样，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不能表明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系，也就不是我们最初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的本意。

总之，我们不能象对待历史上的一般思想家那样，来对待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似乎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就好比“王船山思想”、“谭嗣同思

想”或者“康德思想”等等。这里是有很区别的。可是有的同志不愿意作这种区别，只主张在一般思想史的意义上提毛泽东思想，不赞成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不赞成说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赞成继续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来提。他们认为，作为指导思想，只提马克思主义就可以了。实际上，光提马克思主义是不行的。连非洲的一些民族主义领袖都认为毛泽东的著作比马、恩的著作对他们更亲近，何况我们中国（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不能忘记，由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极大特殊性，由于农民是主要群众和文化科学不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就是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遇到过许多困难，付出过很大的代价。只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努力推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加快了革命胜利的进程。同时，还应看到，作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一经产生，就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是不能随意抹杀的。何况，经过长期历史考验形成为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现在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决议》第28节，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过程。《决议》指出：“主要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毛泽东思想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

首先，解释一下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决议》对共产国际采取分析态度：既肯定共产国际以及苏联曾经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援助过

中国革命，也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错误，在一个时期给中国革命造成极严重的损失。我们的这种态度，同托派全面否定斯大林和第三国际的立场是不同的。不过，在公开文件中，指出共产国际的错误，这毕竟是第一次。过去，我们党只批评自己的错误。在全面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的今天，说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否则，许多问题解释不清楚。例如，为什么王明这样一个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青年学生，能够通过六届四中全会（一九三一年一月）取得党中央的领导权？为什么有些老同志支持了王明？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王明上台，而有些老同志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由本来反对王明转而支持王明。毛泽东同志的可贵，是他较早地觉悟到对共产国际的意见要独立思考，他于一九三〇年五月在福建长汀印发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不要以为有了六次大会的决议（这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产生的），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就可以保障永久的胜利。这种想法，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他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制订革命的战略和策略。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篇表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精神的珍贵文献。

《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里避免了过去一个一般性的提法，说从党建立的时候起就产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这样处理是很科学的。那末，对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党的基本状况和毛泽东同志的作用怎样估计呢？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在当时，无论是孙中山国民党还是其他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治派别，都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国家和民族的出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给人民指出了中国的出路在于彻底推

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党依靠一大批杰出的革命活动家（如象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董必武、任弼时、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邓中夏、苏兆征、彭湃、陈延年、恽代英、赵世炎、张太雷、李立三等），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很快发展成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领导力量；在理论方面，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毕竟是幼年的党，当时，主要是听共产国际的意见。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马列主义有一定的传播，但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产生比较来说，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党成立以后，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战斗，许多党员斗争很英勇，并且表现了非凡的组织才能，但对理论的学习不够。这样，整个说来，党对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理解是不够的，缺乏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所以，我们对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其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不能说这时即遵循“毛泽东道路”，发动了空前的大革命。但是，也不能说，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工作一点也没有开展。《决议》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这个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决议》说“早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前，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这个问题上的右倾危险”。贬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意义，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代表左倾路线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当时主要的危险，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面对着党内外对农民革命运动的一片指责，毛泽东同志坚决支持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最有分量的、为农民说话的历史答辩书，其大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至于个别地方肯定了农民革命斗争中的某种“过火”作法，则是属于枝节问题。

一九五九年，徐特立同志回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情况时说，他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他说：“我过去所崇

拜的康、梁、孙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是渺乎小矣！”

（见1959年12月9日《中国青年报》）。《考察报告》开头即说：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这些话对于徐老这样经历了维新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失败的人来说，当然是感受倍深的。维新变法运动的健将谭嗣同讲过“冲决罗网”的话，这主要是指思想解放，还不是指阶级的解放，因而“冲决罗网”的力量，在谭嗣同看来，自然是知识阶层，而不是工农。革命民主主义者孙中山主张“平均地权”，实际上没有付诸实践，辛亥革命时没有强大的农民运动，他们也没有给农民真正的利益。历史的发展，把农民问题推到现代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期来解决。在这方面，首先是彭湃同志，后来是毛泽东同志，是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所以，就毛泽东同志重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革命、重视农村这个伟大的革命阵地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来说，其思想的发端可推源于大革命时代。其次，就执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新鲜经验的马列主义工作路线来说，也可推源于大革命时代。但是，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真正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并找到了革命胜利发展的道路，是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开始的。这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开始形成。

以下，讲一讲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简要情况。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和工农运动遭到严重打击。如何进行革命斗争？当时党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来反抗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白色恐怖。我党大批领导骨干，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摸索了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这时，毛泽东同志第一次显示了他的伟大作用。他带领秋收起义剩下的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建立了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新局面。毛泽东同志批判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论调，批判了流动游击的错误做法，从理论上阐明了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社会历史条件。他从中国是一个

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这个事实出发，从中国是多帝国主义统治、反革命营垒内部极不统一并充满着矛盾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以下的结论：

（一）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工农武装割据能够坚持和波浪式地向前发展，革命人民以此来抵抗反革命的围攻，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作为革命进攻的出发点，并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逐步夺取城市，以至夺取全国政权；

（三）革命武装和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必然会提高全国人民群众的革命觉悟，逐步动摇反革命统治的基础，促进全国人民大革命的高潮。

这是马列主义的新结论，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这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的结果，不是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搬用现成公式所能办到的。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并未引起全党的重视。相反，他们错误地指责毛泽东同志强调从实际出发、反对从书本出发的正确意见，是什么“狭隘经验主义”。许多同志仍旧把党的中心任务放在准备城市起义方面。并且，通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和一九三二年八月的宁都会议，改变了毛泽东同志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王明在四中全会后不久在党内散发的《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小册子，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增写了“再版书后”，而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这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总纲领。一九三三年初，党中央被迫迁至江西革命根据地，但是，在军事战略等问题上又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导致红军被迫长征，并遭受重大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党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路线，改组了中央书记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把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并开始确立了

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它表明整个党的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

党中央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着手总结土地革命时期党在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方面的问题，先后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写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其中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批判了历次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阐明了党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捍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在这之后，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领导伟大的抗日战争，一方面继续以较多的时间从事理论研究，总结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经验，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等重要著作，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包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的理论具有完备的形态。这是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抗战初期，王明从极左跳到极右，其思想根源仍然是教条会主（如搬运法国、西班牙“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同样有国际背景。由于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的抵制和斗争，它未能在全党占统治地位。一九三八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虽然王明对自己的错误并未真正认识，并且仍然强调要领会布尔什维克经验的普遍意义，但毛泽东同志关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开始受到全党的重视。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

一九四〇年三月，王明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在延安再版。说明教条主义的东西还有一定的市场。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和在全党范围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是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

阶级思想的思想革命运动，是冲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深刻地、精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毛泽东同志的这些著作，规定了整风运动的内容和方针。整风运动的根本任务，是批判和纠正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思想作风，树立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作风。整风运动极大地推进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分清了党的历史上路线斗争的是非功过，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我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最杰出的代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党内有同志提出，可以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亦即中国化的马列主义，称之为毛泽东思想。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王稼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说：“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在同国内外敌人作斗争、同党内错误思想作斗争中生长、发展与成熟起来的。”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刘少奇同志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一文中说：“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的思想。”这里，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提法。这就是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已经系统化了。一九四三年七月底，周恩来同志从重庆回到延安，八月二日，在群众欢迎大会上作演讲，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事实上，经过整风运动，经过抗日时期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党是大大地成熟起来了。反映党的斗争经验的毛泽东思想，这时也得到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所以，在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规定毛泽

东思想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七次大会奠定了以后革命胜利发展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在四年多的时间，人民解放军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并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六年，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中国这样一个东方的大国，确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事件。毛泽东同志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以及《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等，是马列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重要代表作。

但总的说来，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关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等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生前，还处在摸索阶段，甚至发生一些严重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左倾严重错误，造成了令人痛心的损失。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我们必须把它们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

四、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

《决议》第29节和第30节，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如何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这是一件很费斟酌的事情。可以有几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大体上按照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主要经验所作的总结和对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的论